

多重张力中大运河文化遗产与 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研究

路璐 吴昊¹

【摘要】 大运河文化遗产并不必然与国家形象相联接。在当下的形象之争中，面对全球化语境中文明的断层线以及西方话语在现代性话语中一贯的强势地位，我国需征召能体现自身丰厚历史资源的文化符号去建构国家形象。大运河是代表优良传统的巨型文化遗产，也携带驱动国家不断进步的文化基因，符合一种温和、联通、包容的大国形象建构。大运河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三个叙事主题：建构记忆之场、多元与统一的辩证生成以及包容异质与联通世界的话语建构，在话语形式上注重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结合，最终能达到一种“魅力攻势”的形象建构。在重构中，大运河文化遗产联接着历史想象的诸多断层，成为民族国家自我想象的历史镜像。有了完满的历史镜像，民族国家就能从中获得可以言说自身形象的主体性，获得形象建构的话语权。

【关键词】 大运河 国家形象 话语

一、引言

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共同构成了中国大运河的主体部分。作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流淌两千多年，绵延三千多公里，贯穿南北、承接古今。它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商业、经济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2014 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人们对这个古老的巨型文化遗产开始重新重视。

从 2017 年到 2020 年，大运河文化遗产开始频频出现在国家政策性话语中，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多次批示，国家顶层设计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及构建大运河国家记忆体系等。在国家政策性话语中，大运河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开始与国家形象联接，“以大运河打造国家形象的金名片”“展示亮丽的国家形象”等表述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

对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语境下的生存与发展不仅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资源争夺，更涉及国族生存与价值守望的争战。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符号，一旦被国家主体征召，它所携带的历史灵性与文化基因就能建构出一种温和、联通、包容的大国形象。

本文着力探寻的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在什么样的时代语境中被召回，又要如何建构国家形象，以及它所聚焦的话语主题与话语形式。从某个角度看，“把遗址放到特定的文脉中呈现过去，就是一种话语行为”^①。话语的视角赋予我们一种更为轻盈的维度，去跨越历史的蜿蜒曲折，看待这条流向当下公共话语中心的河流。

二、多重张力：形象之争的话语语境

在全球传播的语境当中，国家形象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形象总和。作为一种形象政治，国家形象对一国而言极其

¹作者简介：路璐，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分院副院长；吴昊，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南京 210095）

基金项目：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19ZDA1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重要。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探索国家形象建设的理性逻辑时,敏锐地发现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是一种关键性的资源,“在国际关系中,一种理想的国家形象与声誉的建立比军事力量或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更有用处与价值,一个糟糕的国家形象却导致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这是任何其他方面的优势都无法弥补的,而且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²⁾

在全球化的话语战场中,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形象竞争,面临着自说与他说的问題,国家形象竞争的本质就是话语权之争。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第三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初,著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Stavrianos)著有《全球分裂》(Global Rift)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作者在其中犀利地指出:“第三世界所有民族的共同经验和利益——不管他们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信仰上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只有在整体的结构和动态中才能得以显示和澄清”。⁽³⁾

斯塔夫利亚诺斯把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形成的发达国家集团与殖民主义之后兴起的欠发达国家群体之间的分裂与冲突称为“全球分裂”,一面是世界从多种文明分立并存转变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普遍化的世界,非西方文明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觉醒,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另一面是新殖民主义紧随殖民主义而来,战场更为隐蔽,战术更为复杂。

西方依然寻求对第三世界的掌控权,甚至不惜“先发制人”。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⁴⁾。国家形象之争的冲突与张力根源于此。

对于中国来说,情势尤为特别。首先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所面对新殖民主义秩序的困境与挑战,因为“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宗主国中心与处于依附地位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一种不平等关系”⁽⁵⁾。此外,也因为中国当下的独特处境,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作为唯一延续五千年未曾断绝、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丰厚的资本与出众的成绩。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已深度介入世界,站在灯火通明的世界舞台上,就不能不发声;国家形象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⁶⁾,却在文化新殖民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的影响下无法在世界舆论场中得到客观公正的呈现,究其本质是因为“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也成为一种西方强势国家实现国家扩张的方法”⁽⁷⁾。

中国当然不可能容忍国家形象长期被“他塑”、被扭曲的处境,必然征召自身的历史资源与文化符号去建构自身的国家形象,建立一套符合自身文化安全的话语体系。近年来,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长征这些巨型文化符号在国家话语中密集性涌现,一方面,这些文化符号是国家文化“在场”的彰显,因为国家文化从来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深深扎根于国民“原生性”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土壤之中,并以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基础进行不间断地再生产。

另一方面,既然控制形象与信息是影响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就有必要进行自身的形象生产,对内一统民众对民族自身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理解,对外在世界舆论场设定符合自身利益的中心议程与话语边界,而不是站在世界舞台中心苍白失语。这是第一重嵌在时代节点与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语境张力。

第二重张力属于世界共同性图景与充满文明断层线之间的语境张力。当世界以现代性作为开端,世界共同体的图景还在延续,因人类现代性历史实践所带来的世界历史多元一体的历史叙事并未过时,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依次展开。

应当看到,全球化与地球村曾经带给人们许多乐观的想象与美好的期许,《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莱德曼甚至以“世界是平的”来概括这一图景。但是较为清醒的学者则看到全球化下公共性的匮乏以及充满文明冲突的世界,如贝克就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种新型风险相伴而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与世界主义化之间的关系变得相互矛盾起来——社会的结构和进程

正在世界主义化，与之相比，有关国家的公理体系的知识却保持着偏见……

因此，现在所见到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前提条件，即空间、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性，已然不复存在——尽管（世界）主义的新型组织形式还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⁸⁾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论断“普世价值”的虚妄渺茫——世界不可能成为西方化的统一文明，现实恰恰相反，世界不是一个历史终结的统一世界，而是由“断层线”（faultlines）形成的不同的文明相互对抗的世界。⁽⁹⁾

新媒体使形象之争的情境更为复杂。新媒体依仗智能手机终端、移动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重塑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重构了人类社会。虚拟世界带来了时空的改变：时间表征为空间，空间“成为一种连结各点，并且与自身的经纬相互交错的网络。”⁽¹⁰⁾

对于新媒体，技术乐观主义者一如既往地乐观，认为信息的全球化流动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与民族国家的疆域，开启“信息主义精神”⁽¹¹⁾。另一种声音更为清醒悲观，凯瑟琳·海耶斯看到新的控制：“信息之梦最初具有一种逃离的形象，但当它愈发强力地体现为一个可靠的寄居之所，它就愈发看上去不像是逃离，而是一个竞技场，在这里统治与操纵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角力。”⁽¹²⁾

约瑟夫·奈直截了当地批判与幻灭了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已明显站不住脚的“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并将具备超地域性质的网络空间描绘为各种意识形态相互激荡、交锋的新战场。与传统全球公域相比，显而易见的是，各个民族国家在这个新战场中正不遗余力地构筑自身形象，提升软实力。

外部大环境在进行历史性变迁，国家形象之争的规则与趋势也随之在变化，用汉姆的话说，“这暗示着一种竞争范式的变迁，从现代社会中地缘政治与权力的竞争转向后现代社会的国家形象、国家品牌与影响力的竞争。”⁽¹³⁾战场在变化，战术在变化，话语策略在变化。

这个话语语境的本质性认定，正是我们的理论起点。当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整体而言，遗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竞争的资源，联合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肇始于第三世界国家启用国家力量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资源（玻利维亚与秘鲁一直对“老鹰之歌”归属于谁争论不休，但两国同时都使用了国家权力。

秘鲁宣布其为国家文化遗产，玻利维亚则是通过法令将该歌国家化）。⁽¹⁴⁾对于文化遗产自身而言，它本来就来自于不同国族、社会阶层、群体通过斗争使自身文化价值得到认同的过程，它对民族整合和国家认同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也揭示着“遗产不再被认为是一组具有固定意义的静态对象，而是一种在人类创造物中有意识地赋予纪念功能的社会过程”。⁽¹⁵⁾

三、叙事主题：大运河聚焦国家形象的三重维度

河流与国家文化形象有着不解之缘。如美国伊利运河的文化资源开发与国家名片的打造就紧密缠绕，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将“美国的象征”打造成其话语核心。大运河文化遗产也可以分为三个叙事主题：建构记忆之场、多元与统一的辩证生成以及包容异质与联通世界的话语建构，最终能达到一种“魅力攻势”的形象建构。⁽¹⁶⁾

（一）建构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是法国哲学家诺拉提出的，诺拉在《记忆之场》一书中指出：纪念碑、历史遗迹、纪念日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构筑记忆、唤起记忆的“场”，典型的情景是人们在特定的纪念日来到某个纪念碑前进行纪念活动，这种在特定时间、空间举行的活动就是一个记忆重构的过程。⁽¹⁷⁾大运河作为记忆之场，强调的是国家形象对内部公众的凝聚力。

事实上，国家形象的内聚力在今日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交锋中不时闪现，用彼得·伯格的说法，它是一种跨越历史断层线的神圣“华盖”，永远标注和烙刻在民族斗争和生存记忆的底片深处。⁽¹⁸⁾新媒体对抗性话语加剧集体认同的问题，从共时性仪式到冲突性的实践，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文化安全，如中东北非的颜色革命虽然有多重原因。

但是传统文化记忆在现代性转型中的断裂、各种群体解读的尖锐分歧以及对自身国家形象的想象与重塑中的重重阻碍绝对是导火索。因此，我们在今日语境下召回大运河这一巨型文化遗产，终极目的在于以其作为记忆之场，在历史的蜿蜒曲折中找到一以贯之、不曾断裂的文化记忆，完成它征召个体、形成集体身份的使命，这也关涉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安全。

大运河能作为一个民族的记忆之场，首先在于它巨型的时空体量。从时间上看，它具有丰厚的历史资源，它始于春秋，吴王阖闾开辟胥河，夫差开通邗沟，勾践开凿了以山阴故水道为主的运河；基本成型于隋，隋炀帝为了释放帝国的整个潜力，兴此大役，开通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运河；繁荣于唐宋，唐都长安，“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¹⁹⁾。

元世祖忽必烈截弯取直，打通南北运河航道，使全国水运连成一体，便于赋税进贡，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命脉；成熟于明清，“速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²⁰⁾大运河不仅仅实现了南粮北运，解决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立的问题，还对“中央政府的稳固、地方势力的限制、边境力量的加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消除”⁽²¹⁾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人邱濬的评价“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²²⁾可谓一语中的。

总之，大运河是古代中国的“生命线”，对于维系“国命”居功至伟。在记忆之场中，丰厚的历史馈赠也转为巨型的空间布局。从当下空间体量看，大运河也是巨型文化网络空间，它流经8省35市，跨越地球四十多个纬度，遗产涵盖分类与内容广袤繁多；同时在当下，大运河北连“环渤海经济带”，南接“长江经济发展带”，纵贯“一带一路”，在国家战略空间上起到文化带柔性穿引、融通的重要作用。

巨大的时空体量赋予大运河在今日之语境中被重构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参照框架。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的主体只能是集体，人在其社会化的过程需要参照一个框架才能形成记忆，因此集体记忆先于个人记忆。扬·阿斯曼则进一步用“凝聚性结构”来解释：“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利用参照框架来记录和寻回回忆，记忆不可能存在于这个框架之外。”⁽²³⁾

借用这个理论，大运河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显像，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镜像，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联系，是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

正如扬·阿斯曼在《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中对文化记忆与集体身份形成以及与时代的微妙关系有精细的阐释：“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独有的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和礼仪，通过对它们的‘维护’，这个社会 and 时代巩固和达成关于自身的图景。”⁽²⁴⁾

文化记忆之所以能凝聚国族认同，在于一个群体从这种知识储存中获得关于我们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一种肯定(我们是谁)或否定(我们不是谁)意义上的认同决断得到界定的。⁽²⁵⁾对于大运河来说，它巨大的时空体量被整体升华为一个符号，成为可提供集体身份的象征物，成为文化记忆与国家形象的媒介。

作为记忆之场的大运河，在当下的国族文化竞争中成为一种作为时间与空间双重结晶的“凝聚性结构”，用节日、仪式化以及重复的记忆建构集体记忆，通过象征意义体系征召当下零散个体，使“我”成为“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从历史上看，除了经济功能，漕运本来也是仪式，链接千万个如马铃薯般分散的小农个体。

(二) 多元与统一的辩证生成

大运河是在多元与统一的辩证生成中建构属于自己的特质形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为其代表了人类

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文化融通这一特质在其中熠熠生辉。

大运河沿途所连缀的区域文化，沿岸所涵盖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白蛇传说、苏绣、吴歌、金龙四大王民间信仰及庙会等都是特色显著的文化符号，它们也都在融通中依然保持自身的特质。典型如水网连缀的大运河江苏段，它的民间艺术界流传着一句老话“水路即戏路”，也就是多重艺术形式在运河空间交锋、交流、交融。

在特定文化空间中既流传着花香火、秧歌、杂耍、龙灯、麒麟、荡湖船等民间歌舞，也有昆曲、徽调、京剧等精品戏曲养料，甚至还有一些民歌清曲、田间号子等乡村艺术，它们都沿着运河的迁移与传播，互相汲取养料、为己所用，却不存在互相吞没与取代，构成既独立也杂糅、主体良性沟通的文化景观。正如齐美尔所阐释的，空间不仅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可能，而且空间内要素相互并存。而要素间的主体互动既是对空间的填充，也是空间最吸引人的地方。⁽²⁶⁾

作为漕运主干道的大运河，它北接国家首都，南联江南地区，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催生了璀璨夺目、一体多元的华夏文明。对比欧洲文明，“罗马帝国分解后，欧洲大陆的历史是一部分裂的历史。而汉朝灭亡后的中国内地，虽然统一与分裂交替，但统一要多于分裂，即便分裂期间也存在追求统一的主流趋势……”

通过大运河把一个存在巨大区域性差异的中国连为一体；发达的水陆驿递系统也有效地把朝廷的意志贯彻到各地；信息通信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地域间的互通性。”⁽²⁷⁾从这个角度说，大运河远不止是漕运之河，它是制度、媒介、文化象征之河，提供着大一统国家所必需的公共空间。

在大运河这个公共空间中，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多重区域的文化在此交融互通。尽管这些区域文化多元多样，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却始终如一、自上而下地贯穿其中，成为其精神实质里从未动摇的坚硬内核，以及在共同文化魂魄的统摄下全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

一个国家对物理景观的处理、不同区域文化的构建往往代表这个国家的一种思想路径与形象资源：多元与统一、地域与国家、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张力特质是我国国家形象的内部思想资源与外部治理思路，如赵汀阳《天下体系》所阐释的：“中国思想中的某个‘部分’不可能独立的具有思想的力量，每种思想都具有开放性，都从其他思想那里借力，都依赖着‘中国思想’这个整体结构，所以必须从‘整体’去理解才是有意义的”。⁽²⁸⁾

这种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的文化特质是国家形象建构的情感焦点。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描述的以自我中心主义为取向的西方文明不同，大运河折射着中华文明的某种文化基因，能从容游刃于多元与一体的文化张力中。

大运河区域文化的斑斓中隐藏着某种一以贯之的整体国家制度与国家文化，每个区域文化无论是历史纵轴还是当下空间横轴都有极强的向心力——指向国家，离开国家的区域文化是不完整的；同时每个区域文化也有内部自洽的意义与光芒，携带区域文化的主体意志与特色元素，并不会被一体的宏大叙事全然淹没。

（三）包容异质与联通世界的话语建构

包容异质与联通世界是大运河对自身空间生产的总结与提炼。包容异质主要体现在大运河在沟通南北的过程中，在漫长的时空纠葛中，江南文化特质没有丧失，北方中原文化也没有失去自身的认同与诉求，江南文化内部子区域文化的共同与差异也一直存在，甚至有学者认为江南文化本身就是与北部中原文化多次交流的历史积淀⁽²⁹⁾，而南北文化的互动也形成了全新、统一的中国认同。

从历史上看，有时候，“江南”是中国传统中隐性的文化向心力，以此凝聚华夏文化认同；有时候，“江南”又成了隐性的文化离心力，以此区别于意识形态化的北方中原“规范文化”。

南北交融却不同质化的核心在于容忍文化差异，容纳异质性文化，有能力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衡。⁽³⁰⁾大运河促进南北文化交融的过程，如同建构了霍米·巴巴所说的“混杂性”文化政治空间，这种混杂性的文化空间以文化差异为原点，把自身放在界定性的立场，放在以差异作为文化建构的生产性空间中，放在异己或他者性的精神之中。⁽³¹⁾

从历史上看，大运河是一条联通世界的文化廊道，其北接长城文化带，西挽陆上丝绸之路，东联海上丝绸之路，将平原、草原、沙漠、丝绸之路有机联系起来并贯通成一条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全球商品贸易的沟通渠道。⁽³²⁾

但是这个巨型文化网络之所以能流畅运转，其本质在于它是在尊重差异、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价值”，这才是真正的联通，一面是保有自我，不失去原有的文化根基与血脉；另一面是平等相待，吐故纳新。在处理好异质文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在联通中真正发现世界，而不是扼杀其他“世界”。

回到第一部分所提到的斯塔夫利亚诺斯与《全球分裂》，在本体论上世界是在空间秩序中存在的，“全球分裂”这一核心概念本身就是批判，是作为第三世界的整体对资本主义空间秩序以及空间中主体普遍异化的批判。

空间的历史生产逻辑与经验也会为今日的空间建构提供话语资源，大运河作为一条充盈历史与话语资源的河流，支撑当下中国去追求一种更公平的世界秩序，在对当下空间秩序批判性接收中去建构一个更为理想的世界，正如大卫·哈维所提倡的人民地理学，其精神实质是驱除普世主义、忠实反映社会与物理景观中的竞争性空间关系。⁽³³⁾

大运河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在当下的空间追求就是建构属于世界的人民地理学，这种创造性空间肯定自身主体性，却又不以别的文明为奴役与压迫的对象，它为当下中国提供了表达对世界感受的新位置(a new location)，它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以及兼收并蓄、开放多元的姿态努力构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空间新秩序。

当崛起的中国深度介入世界时，中国负载着开启文明叙事新篇章的情势使命，大运河就是历史的空间镜像，既联通世界又保留自我底色，并能参与涵盖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不断引领发展当代世界文化，在空间的交融中实现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交叠以及各类文化主体的和谐相处，“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看待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在新的价值框架下培育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意识”⁽³⁴⁾。

四、话语形式：重构与虚拟

大运河沿线区域被重构两次。第一次重构是历史上大运河特别是京杭大运河贯通时，它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沿岸赖以生存的数百万民众，重塑沿线各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自然与经济、社会结构与区域文化。第二次重构是在历史中的大运河被当下的话语召回时，运河空间本身也经历了空间的重构。

一方面这个空间是在实体空间的基础上，大运河经过的水、岸、城，依托特定的河道、区域、遗产点以及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以及运河本身蕴藏着的无比珍稀的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颇具中华文明特色的区域文化高地，再造承载着无数国人文化乡愁的文化空间“故乡”。

另一方面是那些作为巨型表征的国家工程，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充分显示“国家文化”的在场，还有各地都在兴建的大运河博物馆如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漕运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等，这 32 家运河沿线博物馆成立了“大运河博物馆联盟”，它们构成了列斐伏尔所说的“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包含一种复杂的符号体系，又充满象征，建构

了一个彻底开放且充满想象力的话语空间。

除了实体空间外，还特别需要注意大运河国家形象建构在虚拟世界的延伸，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大运河文化遗产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首先体现在新媒体提供一种时空共时，展示共存与流动。

新媒体有一种“当前共存性”，能够把不同的历史贯穿起来，新媒体可以很好展示大运河的变迁：农耕时代的漕粮盐运、工业时代的煤炭物资、信息时代的智慧运河如北斗导航、人工智能、5G 等高新技术在大运河船闸、船舶、港口、航道中的使用，多维度时空数据与高可靠船岸通信网络的打造。

总之，多重时代的文明成果压缩在这一线性、巨型文化遗产线路上，不断变化的运河景观中折射着变迁而又生生不息的中国镜像。新媒体空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可视性，可以直观看到大运河中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共处于一个时空体之中。

在这个时空体中，古运河与新运河在历史的时空交错以及新媒体虚拟景观中交汇重合，河流的烟波浩渺与新媒体的虚拟话语体系相互叠加，新媒体空间中大运河沉淀着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实物与象征的“第三空间”，传统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符号在混合的媒介情境中与其他文化元素混合，产生新的意义与灵韵。

在新媒体传播大运河景观、打造大运河 IP 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深度互动、延展与融合，当下的主体意识被深度唤醒并将其叙事视角一直延伸至遥远的历史深处。就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指出的，过去不异于在现在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实中。⁽³⁵⁾运河不仅仅是概念性、政策性的存在，也非仅仅是历史山谷所传回的遥远回声，而是以一种活的历史百宝箱影响当下。

其次，新媒体提供可参与的、互动性的文化逻辑。在传播与人类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个体之间的交流沟通方式与知识的传播推广模式被处于更新迭代之中的媒介工具接连不断地打破并重塑。⁽³⁶⁾

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携手腾讯打造的《穿越时空的大运河》3D+流媒体等数字技术，把数字媒介的技术含量嵌入到大运河传播版图中，用数字影像展示了大运河历史长卷互动 H5 以及种种场景、物象，而用户点击其中细节便可以不断为长卷着色，同时出现对应事物动态词条。

触摸与感受、延展与在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这些新媒体常用的互动方式在大运河文化遗产展示与交互体验中常常使用，它们吸引观众的地方就在于参与、代入和属于主体的自由。

新媒体互动的逻辑提供了主体的解放，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一种动力学的、充满着多重主体的链接在运河景观中生成。德勒兹将其美学旨趣命名为“游牧论(nomadism)”，游牧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同时体现为连续性的生命流(flux)，无所谓谁是中心，而是一种多元互动、生成流变的生态关系。⁽³⁷⁾

比如年轻的受众在社交媒体上读到关于运河某个具体景观的介绍，再亲身探访，最后再把自己生产的新话语传到社交媒体再次传播，其所到之处皆媒介(mediaeverywhere)环境。解放主体，也需要立足当下生活主体的美学旨趣，使大运河的历史与当下通过主体的肉身在场而有机缝合。古运河、今运河、流动的河、历史的河、生活的河流，不同生命体的历史在此交汇，这一点颇似德勒兹提出的“水晶象”(crystalimage)的概念⁽³⁸⁾。

媒介进化史表明，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跨文化交流在新的媒体情境中频繁发生。⁽³⁹⁾也就是说新媒体自会打造一种话语空间，能与其他文化的话语形式化合，赋予一种“当代性”。站在一个更冷静的立场看，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内容核心是属于历史场景的，它更多地携带着的是传统文化的话语。

但是，若要使运河文化在以现代性话语为支撑的电子媒体与大众文化场域中变得流行，并在当下的语境中完成其与现时受众的沟通，就必须找寻一种通往当下的文化逻辑，给零散的个体建构想象国家形象的浮桥。

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播，新媒体提供了新的媒介平台、文化情境、话语生产机制，通过新的话语空间构建共享的符号、认知、仪式，并创造一种共同的意义框架；还可以在互动与协商中加深公众的理解，促进国家形象的生成及其价值的凝聚，形成国族认同。

总之，在当下多重张力的时代语境中，大运河作为一个巨型文化遗产，联接着历史想象的诸多断层，成为民族国家自我想象的历史镜像。有了完满的历史镜像，民族国家就可从中获得可以言说自身形象的主体性，获得形象建构的话语权。

注释：

1 山泰幸、陈旭：《“遗址社会学”的可能性》，《遗产》2020年第1期。

2 Robert L.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

3(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7页。

4 黄力之：《多元文化主义的悖论——对亨廷顿理论的再评价》，《哲学研究》2003年第9期。

5 刘笑盈、贺文发等：《俯视到平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6 Jarol B. Manheim & Robert B. Albritton, "Changing National Images: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nd Media Agenda Sett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September 1982), pp. 641~657.

7 贝克：《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8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9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

10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页。

11 Joseph S. Nye, *Future of Power: Its Changing Nature and Us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p. 140.

12 Peter Van Ham, "Branding Territory: Inside the Wonderful Worlds of PR and IR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2 (March 2002), pp. 249~269.

13 沃尔迪玛·哈福斯坦、张举文：《山鹰之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造过程》，《文化遗产》2018年第5期。

14 Francoise Choay, *The Invention of the Historic Monu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13.

15(25)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How China' 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

16 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17 路璐:《话语、动员与主体——西方传播学界视域中的“颜色革命”研究》,《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

1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65页。

19 张廷玉:《明史·河渠三》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77页。

20 吴琦:《中国古代漕运的社会意义》,《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

21 邱濬:《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之要》卷八十五,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3页。

22(24)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23 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24 孙竞昊:《说说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16日。

25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6 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7 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8 张志庆、刘佳丽:《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理论的渊源与启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12期。

29 路璐:《擦亮大运河文化带这一国家名片》,《红旗文稿》2019年第13期。

30 大卫·哈维、蔡运龙:《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宣言》,《地理译报》1990年第3期。

31 邵培仁:《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构想与愿景》,《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6期。

32 晏青:《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媒介逻辑与社交融入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33 喻国明、杨嘉仪:《理解直播:按照传播逻辑的社会重构——试析媒介化视角下直播的价值与影响》,《新闻记者》2020年第8期。

34 Brian Massumi, A User' s Guide to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Deviations from Deleuze and Guattari,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2, p. 49.

35 路璐、王思明：《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现状、不足与展望》，《中国农史》2019 年第 4 期。

36 韦路、丁方舟：《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